

纪念

顾鹤年

先生诞辰 110 周年论文集

JINIAN GUJIEGANG XIANSHENG
DANCHEN 110 ZHOUNIAN LUNWENJI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山大学历史系 ◎合编

中华书局

纪念顾颉刚先生 诞辰 110 周年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合编
中山大学历史系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 110 周年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系编. —北京:中华书局,2004

ISBN 7 - 101 - 04337 - 2

I . 纪… II . ①中… ②中… III . 顾颉刚(1893 ~ 1980) —
纪念文集 IV . K825.8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4114 号

书 名 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 110 周年论文集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 李森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版 次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271 千字

印 数 1 - 1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 - 101 - 04337 - 2/K · 1842

定 价 28.00 元

前　　言

今年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诞辰 110 周年。顾先生一生治学,对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古史辨学派”的创建者,顾先生的学术成就不仅在近代学术史上具有肇始之功,而且在近代思想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纪念顾先生,中国社科院和历史所于今年 8 月举行学术座谈会。会后,历史所和中山大学历史系商定合编会议论文集。对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出版经费上的支持,我们深致谢忱。

又,顾先生诞辰 100 周年时举办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因故未能出版,现选其部分发言,附入此册一并出版。

编　者
2003 年 12 月

目 录

勤奋为学 终身以之

——纪念顾颉刚先生 110 周年诞辰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

顾颉刚先生治学生涯的启示

——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 110 周年 朱佳木 5

关于纪念顾先生的一点感想 陈祖武 18

顾颉刚先生与中山大学 张荣芳 20

顾颉刚先生与苏州

——顾颉刚先生诞辰 110 周年祭 盛家振 42

山高水长何处寻

——追忆颉刚师二三事 侯仁之 48

怀念顾颉刚先生 饶宗颐 51

契封于商为上洛商县证 饶宗颐 53

回忆初次见顾颉刚先生 李学勤 67

高山景行 永为人师

——浅谈顾颉刚先生的学术和人品 钱宗范 69

从疑古到考古

——顾颉刚先生诞辰 110 周年纪念会上的

发言 张忠培 75

创新是古史研究的灵魂

——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 110 周年 叶林生 79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

.....	王学典	李扬眉	91
顾颉刚与现代史学	刘俐娜		111
重新认识《古史辨》	熊铁基		120
评《走出疑古时代》	黄永年		123
发扬“疑古”精神,推进学术繁荣	李伯谦		131
烛照千载之前 发前人所未发			

.....	王煦华		136
顾颉刚和“古史辨”论拾遗			

——“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 110 周年学术座谈

会后”	罗义俊		141
顾颉刚先生首创性的卓越的《尚书》研究	刘起轩		165
80 年来古史论辩的简要回顾与评析	张 越		182
顾颉刚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学	辛德勇		194
继承发扬禹贡学会精神,进一步推进历史地理学科发展			

——为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 110 周年而作	朱士光		197
中国历史地理学由传统向近代转化的若干特点	李久昌		201
顾颉刚、傅斯年与民俗学	施爱东		225
“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 110 周年学术座谈会”			

综述	雨 辰		243
学习父亲为学术事业而献身的精神	顾 潮		250

附录一:《南方都市报》2003 年 7 月 28 日报道

延续百年学术录魂		255
----------	--	-----

文化需要积累		
--------	--	--

——专访《中山大学民俗丛书》主编叶春生教授	260
附录二：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请大家追思顾先生对我国史学的巨大贡献	林甘泉 262
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	钟敬文 263
顾先生在历史学方面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邓广铭 268
中国古史是层累造成的，是一个科学的大发现	张岱年 270
顾先生是一位划时代的真正学者	赵光贤 272
怀念顾颉刚老师	何兹全 274
顾先生既开风气又为师	周一良 276
顾先生的惊人记忆力	谭惕吾 279
回忆顾先生的几件往事及对我的影响	杨向奎 280
顾先生在为人、作学问上的伟大精神	胡厚宣 283
顾先生轶事	洪廷彦 286
顾先生对史料的广收博采	赵守俨 288
顾先生对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贡献	吴荣曾 289
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	
——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胡 绳 290
顾颉刚先生百年祭	费孝通 295
以崇敬的心情来纪念顾伯伯	钱伟长 302
在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雷洁琼 306
以治学为职业，作真实之贡献	
——读《顾颉刚读书笔记》有感	汪宁生 309
郭沫若评顾颉刚和《古史辨》史学	
——纪念顾颉刚诞辰 100 周年	杜蒸民 318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去向	
——楚国建国传说的初步剖析	谷口满 331
浅述顾颉刚先生民俗学研究的途径与成就	
——简议中国礼俗学	王贵民 345
顾颉刚与苏州研究	高泳源 360
先生风范 众人敬仰	
——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 100 周年	刘艳军 369

勤奋为学 终身以之

——纪念顾颉刚先生 110 周年诞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今年 5 月 8 日,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 110 周年诞辰。顾先生一生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创辟路径,培育人才,对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我国学术界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专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

首先,顾先生和他创立的“古史辨学派”,对当代史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顾先生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积极投入对古史古籍的考辨。他继承我国历代学者实事求是、辨伪存真的优良传统,接受“历史演进”的治学方法,结合自己对戏剧、故事格局的认识,在 1923 年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念中认为: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正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顾先生突破了“经书即信史”,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文献来研究的传统观念。他从立体地逐层分析史料的形成时代入手,然后确定每一层文献的历史涵义。他认识到随着时代和观念的变化,历

代文献中的同一件古史会被染上不同的色彩,所以要重视古史在传说中所经历的变化,透过这种变化,探寻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观念。顾先生这种历史意识达到了中国传统学者未曾达到的高度,因此,“层累说”超越了启发他疑古思想的郑樵、姚际恒、崔述等人的学说,为考辨古史传说和古史资料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

顾先生提出的“层累说”,在史料学领域内建立了全新的典范,动摇了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体系,在当时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古代史料真伪的大辩论。顾先生把这些讨论文章编为《古史辨》第一册,于 1926 年出版。以后又陆续编辑,直至 1941 年第七册出版,收入 350 多篇文章,合计 300 多万字,由此产生了“古史辨学派”(又称为“疑古学派”)。《古史辨》是古史辩论文章的结集,重在资料和见解的提出,不重在结论的统一。其中论点既有根本分歧的,也有大同小异的,需要读者独立思考。可是无论当时史观如何不同的人,都逐步承认了“层累说”在史学上所占据的位置。“古史辨学派”从 20 年代至 40 年代不断深入的探讨,坚持以考证辨析而求真的途径,使古史研究取得了极大进展,直至今日而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核心之一,令海内外学界无法不重视他们的业绩。顾先生无可争议地成为我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其次,顾先生用民俗学材料来印证古史,倡导和开拓了我国的民俗学研究。

以民俗学材料来印证古史,是顾先生治学的一大特点。古史记载中本来包含着许多神话传说的成分,相互冲突,难以在考古学上得到直接印证,而借用民俗学的研究往往可做出合理解释。顾先生通过孟姜女等故事的演变,来论证古史如何由简单变为复杂,由局部地方变为全国,由神话变为史事。他还通过民间歌谣来论

证《诗经》是古代诗歌总集，其中有大量的民间创作；又通过考察东岳庙诸神和妙峰山香会来探讨古代神道和社祀。这些工作不仅为古史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而且开拓了我国的民俗学研究。

顾先生于 1926 年出版的《吴歌甲集》，收集了丰富的资料，还有详细的注释、解说和对一些问题的理论探索，因此不只是一般的歌谣资料集，而是我国第一部具有科学价值的歌谣学著述。顾先生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已成为我国现代民俗学史上最有分量的文章，他用研究史学的科学方法和精神，把两千多年的文献记载和遍布全国各省的民间传说、文学艺术中纷纭复杂的相关资料，按照历史的系统和地理的系统整理出来，被称作“奠定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理论基础”。顾先生和北大同人 1925 年对妙峰山香会的考察，是我国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民俗学田野作业。

20 年代后期，顾先生在中山大学工作期间，主编《民俗周刊》，创办我国第一个正式的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会丛书》，将民俗学运动由北京推进到南方。他在《民俗周刊》的《发刊辞》中提出：“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这种打破尊卑界限，把民间文化、民众生活纳入学术研究轨道的作法，正是当年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具体表现。

再次，顾先生是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杰出创建人。

古代史料研究离不开古代地理研究，因此顾先生在古史研究中对古代地理进行深入探讨。清末民初以来，这方面研究衰落到极点。顾先生为扭转这种状况，于 30 年代初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与学生共同研究《尚书·禹贡》。1934 年，他又联合燕大、北大、辅仁三校师生创办《禹贡》半月刊，成立“禹贡”学会，通过学术团体的公开讨论，推进历史地理的研究。顾先生亲自为学生分发题目，为他们的处女作或者不成熟的

稿件核对补充材料,甚至在修改或重作后仍用原作者姓名发表。这种弘扬学问、培养人材的苦心,使许多青年学子深受感动,走上终身治学之路。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顾先生带领学会同人将研究重心由沿革地理转向侧重边疆地理和民族演进史,《禹贡半月刊》出版了很多这方面的专号,如“东北研究”、“西北研究”、“回教与回族”、“康藏”等等。这些专号学术水平均属上乘,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的问题或资料,至今仍是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的必读之作。

由于顾先生能够认清历史使命,将研究工作合于时代脉搏,以及他一贯倡导平等讨论的学术空气,因而使得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在短短三年多时间中,聚合了各方面的人才,取得了巨大成绩,造就了“禹贡学派”。

通过办刊物来推进学术、培养人才,是顾先生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现在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杂志不是靠名人来支撑,不能以发表名人文章的多少来衡量,而是要看它通过自己的努力造就出多少名人。现代历史地理学领域中的大师,几乎全是当年禹贡学会的成员。以此而论,《禹贡半月刊》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办得最成功的杂志之一。顾先生为我国历史地理学培养了整整一代人才,为建立、发展这一学科打下了坚实基础,影响深远。

顾先生一生献身学术,留下了 2000 万字的著述。他追求真理,不辞劳苦,不贪名利,不崇拜偶像,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不遗余力地提携培育后学。他的这些学术成果和优良学风,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今天我们纪念顾先生,就是要继承这笔遗产,发扬光大顾先生实事求是、献身学术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顾颉刚先生治学生涯的启示

——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 110 周年

朱佳木

各位专家、各位学者：

今年 5 月 8 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 110 周年诞辰。因为当时正处于控制“非典”疫情蔓延期间，所以纪念顾先生的座谈会推迟到今天才举行。历史所的领导盛情邀请我到会发言，而我对于顾先生生前的研究领域全然没有知识，只好临时找来一些有关的书和材料，现炒现卖，班门弄斧。讲得不对的地方，还望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教。

顾先生一生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创辟路径，培育人才，对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他的贡献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顾先生是“古史辨学派”的创建者，他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开辟了中国古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顾先生以批判的态度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积极进行古史古籍的考辨，去伪存真，于 1923 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样一个观念。其主要内容是

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比如，周代人的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比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典范了。我们虽然不知道上古时期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这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比如，我们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但至少可以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但至少可以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以后，他又沿着自己开辟的这条新路，由此及彼，提出要打破非信史造成的“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人化”、“古代为黄金世界”等四个观念，并提出“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和历史”观。

顾先生的这一学说虽然是继承了中国古代从刘知几到崔述等疑古派学者的研究成果，但不再像他们那样是为某种经学理论而辨伪，因而第一次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并由此产生了“古史辨学派”，在当时的史学界造成了惊天动地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后来古史研究的进展。蔡元培先生称誉他的观点是“烛照千载之前，发前人所未发。”郭沫若同志在 1930 年也高度评价“层累”说“的确是个卓识”，“有先见之明”，“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胡绳同志在 1957 年曾著文指出：顾先生在“古史辨”名义下进行的工作“不应当被抹煞”，所谓“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层累”说对整理周秦两汉时代记载古史的文献“是有用的”。1993 年，他在纪念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又重申：“顾颉刚先生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进行古史传说的考辨，做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贡献。”

现在的考古挖掘表明，夏王朝之前也有类似国家那样的社会

存在。但我们评价一个学术成就和一个历史事件一样,都应当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何况即使夏王朝之前还有王朝,也不能断定尧、舜、禹和三皇、五帝、盘古就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古书上对他们的记载就是真实的历史。在中国古代文献和民间传说中,“层累”情况的确是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例如,有人考证就连上海龙华寺和龙华塔的历史,也是越早的记载越简单,建造年代越晚;越近的记载越详细,建造年代越早。历史科学的前提是史料的可靠,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今后考古学界有什么新的发现,都不可能磨灭“古史辨”学术思想对于历史研究的巨大价值。就是我们搞当代史研究的人,现在不是也要警惕和注意剥离史料中那些看起来很具体生动,但实际上却是出于想像的、附会的、甚至是编造的成分吗?

其次,顾先生是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开拓者,他用神话、戏剧、歌谣、故事、传说、宗教等民俗学材料来印证古史,把民间文化和民众生活纳入学术研究的轨道,用传统的治学方法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

以民俗学材料来印证古史,是顾先生治学的一大特点。古史记载中本来包含着许多神话传说的成分,相互冲突,难以在考古学上得到直接的印证,而借用民俗学的研究往往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比如,他通过孟姜女等故事的演变,论证了古史如何由简单变为复杂,由局部地方变为全国,由神话变为史事。他又通过民间歌谣论证了《诗经》是古代诗歌总集,其中有大量的民间创作。他和北大同人 1925 年对妙峰山香会的考察,是我国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民俗学田野调查。他于 1926 年出版的《吴歌甲集》,除具有丰富的资料之外,还有详细的注释、解说和对一些问题的理论探索,不只是普通的歌谣资料集,而是我国第一部具有科学价值的歌谣学著述。上世纪 20 年代后期,顾先生在中山大学工作

期间,又主编《民俗周刊》,创办我国第一个正式的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会丛书》,将民俗学运动由北方推进到了南方。尽管他的这些工作还只是初步的,还有许多粗糙之处,但有谁能否定这些工作对于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开创意义呢?

再次,顾先生是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他创办的“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造就了“禹贡学派”,为我国历史地理学培养了整整一代人才。

古代史料研究离不开古代地理研究,因此顾先生在古史研究中对古代地理也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但是清末民初以来,这方面的研究衰落到了极点。为扭转这种状况,顾先生除了自己撰写论文,进行深入探讨外,还于上世纪 30 年代初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与学生共同研究《尚书·禹贡》。1934 年,他进一步联合燕大、北大、辅仁三校师生创办《禹贡》半月刊,成立“禹贡”学会,通过学术团体的公开讨论,推进历史地理的研究。后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顾先生又带领学会同人把研究重心由沿革地理转向边疆地理和民族演进史。为此,他们在《禹贡》半月刊上出版了很多这方面的专号,其中的文章在学术水平上均属上乘,有不少还是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的问题或资料,至今仍是深入研究的必读之作。

在短短三年多时间中,“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聚合了各方面的人才,取得了巨大成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领域里的大师,几乎全是当年禹贡学会的会员。现在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杂志不能只靠名人来支撑,不能以发表多少名人的文章来衡量其成绩,而要看它通过自己的努力造就出了多少名人。以此而论,《禹贡》半月刊堪称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办得最成功的杂志之一。

顾先生的以上三大学术贡献对于一个学者的一生来说,只要有其中一个贡献就已经很够了。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他,我认为不应当只是讲一讲他有过多少贡献,更重要的,是应当想一想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些贡献,或者换句话说,他的学术生涯给了人们哪些启示,为后人留下了哪些值得学习的精神。

我以为,顾先生第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追求真理的精神。这种精神首先表现在他创立“古史辨学派”过程中的那种求真务实、不畏圣贤、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学术风格上,同时也表现在他对待唯物史观的态度上。诚然,顾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在提出“层累”说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这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尤其可贵的是,他早在 1933 年就声明:他“决不反对唯物史观”,他辨别古书、古史真伪的工作是为了从事唯物史观的人将来搜取材料时“更方便”,是以他的“下学”以利唯物史观的“上达”;而“研究古代思想和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①。正因为如此,胡绳同志说顾先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很早就表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情,并且认为唯物史观的历史研究需要有确实可靠的史料辨别工作为其基础”^②。建国以后,顾先生的思想仍然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有人回忆,他常说:“在马列主义的学习和运用上,自己还是个小学生。”愈是到晚年,他“对马列主义的学习愈是如饥似渴”。他住在医院,桌上“除了一本本古文献外,几本重要的指导史学研究的马列主义原著非常引人注目,拿起来仔细看时,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的心得体会”^③。可是今天一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却带头说什么唯物史观“有严重缺陷”,“过时了”,要用其他理论来“代替”了。他们与顾老先生对唯物史观的态度相比,难道不应当感到羞愧吗?